



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

—— 郑云山学术论文集

■ 郑云山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

—— 郑云山学术论文集

■ 郑云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郑云山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308-06490-3

I. 近… II. 郑… III. ①中国—近代史—研究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IV. K250.7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745 号

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郑云山学术论文集

郑云山 著

责任编辑 葛玉丹 王长刚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234 千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06490-3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序

熊月之

这是一篇让我倍感沉重的序言。文集汇编时，郑老师嘱我作序。收到文稿时，郑老师已撒手西去。嘱序作序，旬月之间，已是天人永隔。回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历历往事，顿现眼前。

我与郑云山老师的因缘基于陈旭麓先生。他是陈先生在 60 年代初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是陈先生的重要助手，与陈先生一起教书、编书、撰文、下乡搞“四清”，直到 1973 年才调离华东师大。我是“文革”后考入华东师大的。论学问资历，他是我的师辈，论师门之谊，他是我的师兄。我总习惯称他老师，他总强调仅是师兄。我已记不清我们交往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见他面以前，已闻名久矣。陈先生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心情不快时，常会念叨郑云山的名字，说是假如郑云山不调走，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郑老师在陈先生心中的分量。陈先生在世时，我与郑老师在业务上有许多联系，共同商量研究项目，共同参加会议，多与陈先生有关。陈先生去世以后，我与郑老师见面谈话，中心议题也总离不开陈先生。

郑云山老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发表过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关于戊戌时期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

分析,维新派民权思想特色剖析,义和团扶清口号的思想基础梳理,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之关联,或创榛辟莽,发前人所未发,或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推进,均言而有征,论有新见。他对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不时参与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近代民主思想问题,他都综核众说,融会贯通,参以己见,成一家之说。郑老师论史,每每视角独特,发人深思。太平天国历史曾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成果多,挖掘深,要将其推向前进难度很高,郑老师独辟蹊径,从人才问题入手,对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这方面的差异,指出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才能未必强于洪秀全,但是,他在重才、识才、用才、育才、荐才方面,相当高明,远在洪秀全之上,这是曾胜洪败的重要原因。所论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令人信服。

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极端重视搜集、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他对于秋瑾、汤寿潜、王金发等浙江名人的研究,搜罗广,挖掘深,考证细,思虑密,立论允当,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他撰写的《秋瑾》传,史料史识,都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鉴湖女侠”的最好水平,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他对于汤寿潜与秋瑾案关系的辨析,推翻了延续八十多年的陈说,为汤寿潜洗刷了冤屈,为历史求得了公正,《辞海》有关词条采用了他的成果。他关于王金发在辛亥前后史实的考订,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金发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他参与主编的《浙江近代史》,参与搜集、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为全面了解浙江近代历史、梳理浙江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云山老师学问优秀,道德高尚。他对待老师,相当敬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华东师大陈旭麓、郭圣铭等老师对他的帮助。特别是对陈先生,他敬之、爱之、助之,尽一切可能帮助老师分忧解难。为作此

序,我重读了陈先生与郑老师的三十多封通信。他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国家大事,谈身边琐事,也送礼,也借钱,絮絮叨叨,一片至诚,喜怒哀乐,毫无掩饰,那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交融,堪称恩师爱徒的典范。郑老师对待学生,视同子女,一片赤诚,授业、解惑,更重传道。我曾不止一次受他嘱托,帮助他的研究生,查找资料,解决难题。他对待朋友,襟怀坦荡,乐于助人。我每有问题问他,他总是有问必答,热情相助,毫无保留。我有著作出版,呈送请教,他在鼓励之余,对于存在的问题,也都认真指出,大自观点的提炼、史料的征引,小至错别字与标点符号。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诲人不倦的老师,难得的益友与诤友。

哲人已逝,德业永存。这本论文集是郑老师的一批学生奉献给老师的孝心,是对老师的感恩,也是对郑老师最好的纪念。书中许多高见卓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将会继续造福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郑老师已是不朽。

2008年9月15日

我的自述

一、生平简历

我于1937年2月3日(农历丙子年12月12日)出生在杭州东郊一个叫七堡的靠近钱塘江的小村庄,那里虽然没有美丽的风景,但也是一片农村的自然风光,它濒临钱塘江,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潮水,那时常有渔民跑在潮水前面,将潮头的鱼用网兜兜起来(这叫“抢潮头鱼”),然后将鱼拿到街上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所以,那时虽然家里很贫困,但我常常可以吃到各种各样新鲜的鱼,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我在虚龄9岁(1944年)才开始读小学,1950年在七堡小学毕业,毕业后在七堡镇上的一家棉花加工厂做了半年童工,后又回家务农半年。

1951年9月的一天,我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转折。这天晚饭之后,我在家中剥黄麻,我们村的沈村长来告诉我已被推荐去七堡供销社当职工,让我第二天就可以去上班。开始时,除吃饭外,每月只有1块钱的工资,但五六个月之后就逐渐增加了。就这样,我一直在供销社工作了很多年。

1954年我离开七堡,调到笕桥、丁桥等地的供销社从事棉、麻、蔬菜的收购和推销。1955年,杭州市供销社成立了蔬菜经理部(原址是清泰

门,后迁到菜市桥),所谓的蔬菜经理部实际上是杭州市蔬菜公司,我被调到该部财务科从事出纳工作。我以前没有正式学过财务,怎么能当出纳呢?这是因为我在棉花加工厂当童工时,旁边正好是棉花收购点,他们在收购时,交易的声音被我听得很清楚,于是,我在空闲的时候一边听一边练习打算盘,到我进入蔬菜经理部时,我的算盘已经打得很精了。正是由于我的算盘打得好,所以被调去当出纳。我在这个经理部工作了一年多。

1956年,我的一个同事以初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这对我震动很大。原先我也很希望读大学,但总觉得凭我小学毕业的文化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我听说了这个同事的事迹后,很受鼓舞,知道考大学不一定非有高中的学历不可。不久,我从别人手里借来所有参加高考所需要的书本(当时文科高考不考理科知识,而且外语也可以免考,我只要准备语文、地理和政治等科目)。我白天上班,晚上自学,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自学,就学完了所有的考试科目,并于1957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于是,我离开杭州去上海读书,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我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1年下半年,读完了本科所有的课程,并顺利毕业。毕业前夕,系里本来打算让我留校当老师,我很高兴,因为我比从中学考入大学读书的同学的年龄稍微大了一些,再加上老家还有老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他们经济上比较困难,我工作后可以给他们一定的资助,就不希望再读下去了。可是,等我暑假结束回校后,系里通知我不当老师,而是被保送读研究生,原本被保送读研究生的钱宏同学则留校当老师。这个变化是校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决定的。他认为,钱宏具有很高的文艺天赋,让他留校可以为学校保留一个难得的文艺人才。

1961年是由我国自己培养研究生的第一年。在此之前,正式的研究生都是被送到苏联去培养的,硕士被称为副博士。那一年读研究生的人选是由组织研究决定的。我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导师以陈旭麓先生为主,还有钱实甫先生和夏东元先生。我们专业共有七人,读了一年后,有

两人去做中学教师,其余人继续读,导师也重新分配,陈旭麓先生直接当我的导师。1965年7月,我硕士毕业后,组织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在华师大学习和工作期间,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

1957年下半年,我们一年级新生刚进学校,就参加了“鸣放补课”,大多数同学都知道“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所以都没有对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也有来自偏僻地区的同学因消息闭塞,并埋头准备考大学而不关心时事,还不知道当年的上半年已经开展过“反右”斗争。有个来自江苏扬州农村的同学积极参加,结果被打成“极右分子”,先被送到浙江四明山,后又被送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从此音讯全无。1958年,我国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国家提倡学生“勤工俭学”,学校除了平时要我们去工厂(我个人就去过纺织厂、翻砂厂等)劳动外,每年还组织我们去农村劳动,上半年是“三夏”(割麦子、割油菜籽、插早稻秧),下半年是“三秋”(秋收、秋种、秋耕),这些劳动是十分辛苦的。从1957年下半年进校读书开始到1959年上半年整整两年时间内,我们实际读书学习的时间并不长。而到1959年,又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饭也吃不饱,没有力气参加劳动,下去的时间就减少了,这种状况持续到本科毕业为止。

1965年5月,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被指定到解放军驻上海浦东的部队当兵三个月,在部队期间,我完全按照正规要求进行训练。同年9月,组织决定华东师大部分师生去安徽搞“四清”,我也在其中,与来自安徽全椒县及滁州军分区的干部一起组成“四清”工作组。我奉命参加了其中的两期活动,第一期在安徽定远县桑涧公社机关,第二期与全椒县的一个干部在定远县三河镇槐墟公社槐上生产队。第二期的生活很艰苦,因为当时上级要求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公社的粮仓里,由于仓库很小,夏天很闷热,而且蚊子很多,睡得很不好。当时,定远县农民的生活很贫苦,整个生产队只有一户农民家里有蚊帐,

而且很多农民家里连床也没有,是用土坯在两头搭起来,中间的上面放上用芦苇秆子编成的东西当床睡,下面则当猪圈(猪白天放在外面,晚上养在家里),所以很脏。我在生产队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搭伙吃饭,吃得也是半饥半饱,几乎没有菜,只有一点辣椒和霉干菜,白天还要和农民一起劳动。半年后,我的体重下降了18斤。尽管这样,心情却很愉快,很充实。1966年8月,当我们在三河公社搞总结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立即全部返回上海。因为这时“文革”已经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四清”工作组成员回原单位参加“文革”。

回到华东师大后,我们工作组成员都散开了,有的当“造反派”,有的当“保守派”,有的当“逍遥派”,还有的出去搞“串联”。“文革”初期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参加过“串联”活动,此后就一直当“逍遥派”。我当时条件比较好,一是我出生贫下中农家庭,二是没有正式上过课,不存在向学生放过“毒”的问题,别人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也没有人注意我。在学校里,我除了看一些经典著作外,就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打牌、下棋。期间我也写过一些大字报,都不是针对具体的人写的,如写了《坚决反对怀疑一切的错误口号》,但没有引起别人的论战,倒是被有些人抄写过几次。

从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春,我还到华东师范大学设在苏北盐城大丰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包括挖沟、开荒、改造盐碱地、种粮食,还有挑大粪等,因为这是初创性质的劳动,所以比一般劳动更辛苦。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还担任历史系“尖刀班”班长,虽然我的力气不是最大,但也是拼命干活,终于撑了过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劳动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使自己可以吃得起苦,也知道劳动者的辛苦,我的适应性也大大增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吃的苦太少了,当然不是要他们承担很辛苦的体力劳动,但是,适当参加一下劳动还是有好处的。

1970年初,国家要求“复课闹革命”,开始招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我就被学校从“五七”干校招回来编写讲义,准备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我

1971 年回来,参加“教育革命”,后来与学生一起搞些社会调查。

这样过了几年无所事事的生活,加上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杭州老家,也不可能调到上海,所以我很想调回杭州,经过几年的争取,我于 1973 年 11 月 3 日调到杭州大学,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一直到 1978 年恢复招生,我才第一次走上讲台讲课,主要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我于 1999 年退休,返聘一年,2000 年正式退休。在杭州大学期间,我先后担任过历史系副主任、校科研处分管文科的副处长,从 1992 年开始到 1997 年,兼任杭州大学董氏基金会(是香港董建华先生为帮助杭州大学的青年学子从事科研活动而提供给杭州大学每年 5 万美元而成立的)办公室主任(期间我回历史系工作,仍以历史系教师的身份继续当主任)。

我于 1973 年 10 月入党,1978 年被评为讲师,1982 年晋升副教授,1992 年晋升教授。

在我求学和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做人的基本准则。主要有:

1.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平等友善,不卑不亢,不以人贵而阿谀奉承,不以人微而鄙视。
2. 抓紧时间,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3. 同情弱者,对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
4. 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我很欣赏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以上是我一生恪守的基本准则,从来没有违反过。

二、求学与教学之路

我在 1957 年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前的正式学历是小学,没有读

过初中和高中,在学习的基础上先天不足。为了跟上别的同学,我刚进大学时学习很刻苦,这是很有名的,我除上课之外,一有时间就复习功课。当时,整个本科期间的教材是全国统一的,但国家要求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即不断对其中所谓的“封资修毒素”进行批判,重新编写教科书,课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来指导,要求在教科书的每一页都引用他们的语录作为学术观点的根据。所以,我在本科基本上学的是革命史的内容,虽然学习经典著作也有一定的好处,但真正的历史史料和观点的学习却很少。另外,我还学了三门外语,开始是学俄语,起初连俄语字母也不认识,经过努力,开始好转,记得在读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来做报告,我已经能够听懂三分之一的话了;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恶化,我不学俄语了,改学英语,也没有学好;后来在研究生阶段我又学了日语,也没有学好。因此,我的外语学习是失败的。经过努力,我的专业课程进步很快,本科四年期间,只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是四分,其余课程功课都是五分,我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都得到老师和领导的肯定。

到了研究生阶段,虽然“教育革命”还在进行,好在导师授课时,在每个单元之前,都要布置我们先看大量的原始资料,同时也开列一些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通过这样的训练,专业知识与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加强,古文基础也提高很快。

下面谈谈我从教之后是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的。

作为教师,无论是新开的课程,还是已经上过多次的课,我在讲课前都能认真备课,并仔细编写、修改讲稿,讲课时力求做到条理清楚、语言准确、生动有趣。我写的讲稿要留下三分之一的空白,一旦自己有了新的想法,或者发现有新的材料和理论观点就及时充实到讲稿中去,因此,我在讲同样一门课时,每次讲课内容都有所变化。我一共讲过五门

课,共讲过三十来次,我从来没有听到有同学对我的教学有什么不满的言论。

从我带研究生开始,我都要求研究生做到用功、用心,要积极主动地去找材料和思考问题。除了专业资料和经典作家的书要看外,还要求研究生认真阅读两本书:《鲁迅全集》和《梁启超选集》。鲁迅和梁启超看问题很敏锐,思维也很活跃。鲁迅的文字丰满而洗练,隽永而舒展,《鲁迅全集》及其注释可以说是中国史的百科全书;而对梁启超而言,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都能被他用流畅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因此,阅读两位大家的作品,对提高写作也很有好处。

在从教三十来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参与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指导 18 名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在高校、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有的已经是高校教授、出版社副总编、党政部门负责人、私企老总,还有的已是博士或博士后,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出色的表现让我感到很大的欣慰。长期以来,我和这些学生大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我生病住院期间,他们多次来看望我,给我送钱送物,问寒问暖,使我感到浓浓的师生情谊和作为一个教师的崇高,同时也是对我昔日教学工作的肯定。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他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三、两位重要的老师

在我的求学之路中,有很多老师给了我指导,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旭麓先生,其次是给我们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郭圣铭先生。

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陈先生,那时,他大部分时间正在北京与其他一些专家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直到 1961 年夏,他完成编写任务,才回到上海,我恰好也是在 1961 年 9 月开始读

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导师有三个,其中以陈先生为主。他经常在上新的学习单元前布置我们要读些什么,掌握些什么,并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到了要开始写毕业论文时,导师进行了重新分配,陈先生成为我的论文指导教师。从此以后,我们的接触开始多了,他给我们开了一些论文的备选题目,又针对不同的题目指出可以看哪些书,然后指导我们写大纲及初稿。当论文初稿写好后,又经过他的认真审阅,进行修改,最后定稿。此外,我们还经常去他家,接受他的耳提面命,陈先生通过闲谈的方式对我们传授知识,并教我们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有一次说到戊戌变法时顽固派反对民权,但苦于找不到理论,等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后,为顽固派反对民权提供了很好的论据,顽固派欢呼雀跃,说“大打民权三百板,民权屁股危矣哉”,陈先生认为这句话很形象地反映了顽固派当时的心态,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引用这样的语言以增加文采。另外,陈先生要求我们写作时语言和结构都要简洁,不要讲空话。陈先生的教导使我受益终生。虽然我在学问上不能望陈先生之项背,但在写作上一一直努力做到简洁明了,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1965年4月份,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组织上正在研究我留校当教师一事。当时,担任研究生指导员的副科长无故忌恨我及其他三个同班同学,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在我留校的问题上就极力阻止,甚至跑到我的老家七堡去了解情况,只了解到我的二舅父在1951年“镇反”时被枪毙,而我在校读书放假期间经常到我的外婆家去,他就以此为理由,说我阶级界限划不清,以此来阻止我留校。陈先生仗义执言,说:“郑云山去看自己的外婆没有错,并不能说明他的阶级立场有问题。”这时,陈先生担任学校的副教务长,比这位副科长的职务要高很多,所以我最终留校当了老师。

1965年9月,我当兵三个月回来后,与部分师生集体去安徽定远县搞“四清”,我们师大历史系搞“四清”工作的同志由陈先生带队,他是大队长,我们到了定远后参加了两期“四清”,前后11个月。在此期间,陈

先生对我很关心。我们常常很晚才回来,因为当地很荒凉,常有狼出没,他知道我怕狼,就让我走在前面,自己殿后,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学生的关爱。当然,陈先生有时遇到一些困难,我也帮他解决,他对我也很感谢。1966年8月,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全部返回上海参加“文革”。

陈先生回上海后,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随便走动,我们也很难与他接触,1969年以后陈先生逐渐被放松人身限制,我和几个同事就经常去看他,他也很欢迎我们,并且经常要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经常出于礼节而拒绝。有一次,陈先生突然发脾气了,涨红着脸对我说:“你是不是怕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传染给你而不肯留下吃饭呢?”于是,我说:“既然陈先生您这样讲,那我以后就一点也不客气了。”从此以后,从1970年开始,我每半个月去一次陈先生家并吃中饭,他和子女对我都很热情,我和陈先生的子女至今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这次我生病住院,陈先生的三个子女还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来看我。

我和陈先生在一起时,毫无保留地谈论各种事情,最主要的自然还是在时政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对我说对“文革”很反感,说这样下去我们国家要灭亡了。还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我们的党被搞成这样了,自己想退党,当时我劝他不要退党,因为退党的性质要比被党开除还要严重,前者是党要你而你不要党,后者是你不要党而党不要你。经过我的劝说,他也就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再提出退党的要求。陈师母在1970年病逝后,陈先生独自资助两个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并抚养在身边的小儿子,经济负担较重,但他还是将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党费上交。后来,当他听到林彪坠机死亡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非常高兴,说:我们国家从此有救了。这些都说明,尽管陈先生对党在“文革”期间的政策有所不满,但他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发牢骚是因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表担心,是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赤子情怀。

到1970年工农兵学生进校后,陈先生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组,但这并不是他自己愿意去的,而是因为他的文笔好,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些

人提出来让陈先生去的。陈先生去了以后,只写过一两篇文章,我只知道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李鸿章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时,有些人说陈先生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而写作组是“四人帮”的笔杆子,在当时情况下,陈先生是百口难辩,不管他怎样讲都无效,使陈先生很苦恼。这时,我已调回杭州,他在信中向我述说自己的苦恼,我也回信劝慰他:只要如实将情况说清楚就行了,至于别人怎么讲别去理会,反正迟早会搞清楚的。经过调查人员几年的调查,就没有发现陈先生有什么问题,于是,陈先生在1978年回校工作,但这事也使他受到了损失。他那时刚好晋升为教授,但是没有批准当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因为他的年龄超过了规定。陈先生刚回师大时有点心灰意冷,因为当时学校里有些人分外得志,并想把陈先生整倒,陈先生很气愤,也很无奈。当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希望他去工作,该院的副院长杨慎之亲自来上海请他去,并承诺很多条件,陈先生问我要不要去,我劝他不要去,因为他的家在上海,一个人在湖南,生活、看病、子女看望都不方便,在我和其他一些同学的劝说下,他就放弃回老家湖南工作的想法了。在我要求调回杭州前,陈先生要我不要回杭,我说了自己的理由,并请陈先生网开一面,最后他忍痛答应我回杭。

我回杭后,与陈先生的直接接触减少了,但经常与陈先生通信,他有一次在信中说,“你的离去让我若有所失”,并称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助手,这让我感到对不起陈先生。除了经常性地联系外,陈先生还一如既往地给我各种帮助,现在想起来,真是十分感慨。

记得有一次,有个法国女历史学者很佩服陈先生,认为他是杰出的学者,邀请陈先生到法国去,但由于上海有些人的阻止,他没有成行,我当时提出,如果可以的话,请他推荐我去法国,他答应了,但我也没能成行。1983年冬天,我们一起去西安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近代史研究》的编辑宋士堂先生对先生说,他们需要几个年轻的学者去接替年老的编辑,陈先生立即推荐了我,我很高兴,但当时杭州大学正准备要

我担任副系主任，不同意我去，我也就没去成。总而言之，只要有锻炼的机会，陈先生就会推荐我去。

陈先生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经常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回杭州后，有一次，我老家的茅草房要改成瓦房，我母亲要我想办法筹钱，我就向陈先生借了约 1000 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陈先生毫不犹豫地将钱借给了我，我也想办法很快将钱还给了陈先生。

1988 年 12 月 1 日，陈先生突然去世，闻此噩耗，我感到真如晴天霹雳。我与妻子在第二天赶到上海，想去见他遗体最后一面，但当时他已被送到上海龙华殡仪馆，遗体告别还要几天，我就回到杭州，几天后再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会。那次会上人山人海，大家对陈先生充满了敬仰，我们几个“入门弟子”都被安排在棺木旁，等遗体告别时，大家无不号啕大哭。从此以后，我就与敬爱的陈先生永别了。

郭圣铭先生在民国时期是国民政府驻美国新奥尔良的领事，当时的思想就很进步。后来，周恩来总理派人请他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就带领全家回国，在华师大历史系工作，讲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他虽然有点口吃，但课讲得很好，讲课稿是自己编的，文笔也很流畅。他不但课上得好，对学生也很爱护，从来不摆架子。1958 年的某天，我在校参加劳动施肥时，臭气上升，郭师母要我们注意，我当时很气愤，并与她争论。后来，别人告诉我她是郭师母，我就担心以后郭先生见到我会说我，但是郭先生从来没有提到过此事，而且和我们讲话总是和颜悦色的。不过，他对那些不好好搞学问的教师却常常毫不客气地批评。郭先生真是正直的人。

郑云山口述

郑理明整理

2008 年 5 月 5 日

于杭州浙江省立同德医院